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生态现代化的优势

吴世韶 李建涛

(广西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6)

摘要:生态危机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挑战,中国与西方各国对生态危机相应做出了对策。西方国家提出生态现代化,这种现代化是建立在人类中心主义、唯科技论、西式民主等基础之上,但未能有效解决生态危机。中国提出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这种现代化是基于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指导和保障,实现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共赢,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生态现代化的优势。

关键词:生态危机;西方生态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F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23)06-0005-09

doi:10.19742/j.cnki.50-1164/C.230601

现代化是一个复杂多维的概念,涉及经济、社会、生态等各领域的变革与发展。不同国家和地区由于地理、历史、文化等因素差异,对现代化衍生出不同的理解和实践模式。部分西方学者将现代化归纳为工业化、科技化和民主化等进程,认为这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趋势和普遍规律。然而,这种观点,忽略了现代化进程中存在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以及现代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和挑战。事实上,西方国家在探求现代化进程中,虽然带来了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但同时也造成了生态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双重叠加。为了应对危机,西方国家提出生态现代化的理念,试图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平衡与协调。

中国同样面临着现代化的抉择与挑战。针对当前社会发展中“人与自然”关系面临的新挑战,中国给出的答案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理念,并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紧密融合。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借鉴了现代化理论的合理部分,并且形成中国独特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成果。因此,中国学界极有必要探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相对于西方“生态现代化”所具备的优势,并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指导。

一、生态危机与经济危机叠加的现代化危机

人类历史上曾遭遇过各类的生存和发展危机,通常这些危机呈现出较为单一的爆发形式。然而,自

收稿日期:2023-10-20

作者简介:吴世韶(1971—),男,湖南涟源人,法学博士,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李建涛(1999—),男,广西贺州人,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人类社会步入工业文明时代,“世界市场”和“世界历史”的形成,危机所暴露的“多样性”即以“叠加态”呈现在人类面前。人类当前面对的是一个复杂多元的结构性危机,“复杂多元”的“结构危机”体现在以下方面:其一是危机的广泛性,这一危机不再局限于特定国家或地域,而是涵盖多个国家和地区,甚至跨越全球范围,因此对国际社会产生广泛的影响;其二是多领域性,这一危机不再局限于某些特定的领域或者行业,而是涉及社会、政治、经济等多个领域,呈现出高度立体性和复杂性;其三是时空复杂性,这一危机不仅涉及短期性或者周期性的问题,而且更加具有集中性爆发的特点,可能会在短时间内恶化并且迅速扩散。

(一)生态危机与结构性危机的关联性和同步性

生态危机是结构性危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这一结构性危机与生态危机的爆发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性和同步性。这种关联性和同步性表现在资本逻辑与生态危机之间、资本逻辑与经济危机之间的相互作用。

一方面是资本逻辑与生态危机的关联性。这一关联性体现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自然资源的无限扩张和消耗。资本逻辑以利润为最高目标、以扩张为核心动力,这一逻辑驱使着人类不断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和剥削,以此满足人类社会迅速增长的物质财富需求。然而,自然资源是有限的,当人类对自然资源的需求超过了自然系统的承载能力和恢复能力时,就必然会导致生态系统的破坏与失衡,从而引发各种生态问题,例如全球气候变化、水土流失、物种灭绝等。

另一方面,资本逻辑与经济危机的同步性。这一同步性体现在资本逻辑的内在矛盾和危机倾向。资本逻辑所塑造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竞争为基础、以效率为导向、以增长为目标,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通过对劳动力、技术、市场等要素的组织和控制,推动生产力的提高和商品化程度的深化,形成了社会财富的极度集中和分配不公的现象。这一经济模式存在严重缺陷和弊端,导致市场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和结构性失衡,引发生产过剩、消费不足、市场失灵等现象,这些现象使社会不安定因素激增,为经济危机的爆发埋下了隐患。资本逻辑不可阻遏的生态拓展和资本主义饮鸩止渴式的剥夺积累,导致任何不触及制度改革的环境治标举措都将归于徒劳。因此,资本逻辑与生态危机、经济危机之间的相互影响证明了生态危机和经济危机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作用和影响的。

(二)传统工业化所导致的“不可持续性”

资本逻辑的两个抽象方面所呈现出的具体样态就是传统工业化,传统工业化如今在自然和社会两方面都出现了“不可持续性”的特征。

一方面,传统工业导致了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和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传统工业化自诞生之时,就将自身置于自然的对立面,并将自然资源纳入大生产环境之中,在资本主义役使下自然的地位变成了“客体”,而人为“主体”,形成了“主客体二分”的逻辑悖论,大生产过程中对于自然资源的吞吐使其成为“高耗散”的系统。这种生产方式不仅违背自然规律和生态平衡,而且也造成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极度依赖与贪婪,至此宣告了传统工业发展在自然方面的“不可持续性”。

另一方面,传统工业削弱经济的基础和发展的潜力。位于工业化前沿的欧美发达国家利用先发优势取得了经济腾飞,资本家通过资本生产要素的组织和控制,获取了巨额的利润和财富,而工人阶级被剥夺了劳动价值和社会权利,陷入了被剥削和日益贫困境地。但冷战后开始逐步进入了传统工业发展的疲软期,随之伴生的是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的转型。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低速增长的传统工业的产业资本和摇摇欲坠的现代经济的金融资本冲击了社会体系的稳定性。这种经济模式不仅加剧了社会贫富差距和阶级矛盾,还引发了社会政治、文化等领域的深刻变革,至此宣告了传统工业发展在社会方面的“不可持续性”。因此,传统工业化在自然方面和社会方面,都呈现了“不可持续性”的特征,正如哈贝

马斯所言:“任何臣服于资本积累需要的文明都蕴藏着自我毁灭的种子。”^[1]资本主义国家积聚的生态危机和内部的经济危机相互牵合冲击着脆弱的社会秩序,其生态危机不仅是现代意义上的历史性难题,也是现代化运动中的客观呈现。

(三) 西方国家提出的“生态现代化”理论

20 世纪 70 年代,环境议题第一次在联合国大会中被提出。但在冷战时期的国际背景下,两极对峙的国际政治格局致使各国以国家安全为战略核心,优先考虑全面核战争的安全性威慑和经济萧条的持续性威胁,而将环境问题视为次要或边缘的议题。因此,环境议题并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和重视。

随着冷战的结束,国际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国际社会进入了多极化和全球化的新阶段。在此阶段,各国间的相互依存与合作日益加深,同时也面临着全球性的挑战和危机。此外,传统工业增长模式难以为继,资源和环境问题构成的威胁成为关乎人类社会存续和共同合作的全球性议题。对于危机的战略就不再局限于国别范畴,而是立足于全球范围之内的工业化国家的“生态化生产模式结构转型”。各国需要在全世界范围寻求共同的解决方案,并且调整本国的工业发展模式。

西方理论界和决策界开始反思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功能失调所导致的一系列经济问题和环境问题,并在此背景之下进行了解决经济危机和环境危机的理论性与政策性尝试。西方学者在 20 世纪 80 年代提出的“生态现代化”理论,其时代意义在于指出解决环境问题需要经济发展和政策相互结合,基本论点从“平衡经济与环保”转变为“保护环境实现经济发展”,其目标从对污染现象的处理转变为从污染源头开始处理。但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提出的“生态现代化”真的能有效解决生态危机吗?

二、为何西方生态现代化不能解决生态危机?

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在自然领域的具体表现,反映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自然生态系统之间的不协调与不平衡。这一矛盾是由资本主义追求无限制的利润和增长,而忽视了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和生态环境的脆弱性所造成的。因此,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与自然规律之间的冲突和对抗的结果。

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家试图在资本主义框架内寻求解决生态危机的方案,认为按照资本运行轨道通过经济补偿、技术创新、市场调节等方案,可以实现经济增长和生态保护的协调,从而解决生态危机。然而,这些方案并没有触及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与逻辑,也并未改变资本主义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掠夺和破坏的模式。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家的方案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而只是在资本主义框架内部进行表面的修补和调整。人类要真正解决生态危机,必须先破除资本主义改良方案的“迷信”,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根本性的变革,建立一种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

(一) 以人类中心主义为“迷信”的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哲学批判

西方现代化理论是一种以人类理性和主体性为核心的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从文艺复兴时期出现萌芽,并在启蒙运动中达到高潮,在西方文明逐步演进的过程中,逐渐摒弃了封建迷信和神权统治,建立起了人类自主和自由的世界观。西方文明步入近代阶段,启蒙思想家们高呼人类是“此岸世界”的主人,将上帝复归到“彼岸世界”,将自然变成人类的对象和资源。从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到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再到康德的“人为自然立法”,无不彰显了人性的至高无上。在资本主义框架之中,人类以“征服者”的姿态来对待自然,并且自诩为自然界的“新上帝”,实现了对自然的控制和改造。这种以人类中心主义为“迷信”的西方现代化理论,奠定了人与自然“主客体二分”的哲学基调。在这种基调下,人类获得主体性地位,自然则被排斥在主体世界之外,成为了被动的对象,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关系

由此形成。在这种对立关系当中,人类自诩为世界的中心,而忽视了自然的价值和生命,从而形成了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

人类中心主义是一种把人类置于自然之上,把自然视为人类的附庸及工具的价值观。人类中心主义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批判:第一,人类中心主义导致了人与自然的对立和割裂。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类是自然界的主宰和改造者,自然是人类的客体和资源。这种“主客体二分”的思维,使得人类对自然的態度变得冷漠且贪婪,使得人类对自然的行为狂妄且暴力,人类以一种凌驾于自然之上的姿态来对自然界进行肆意的索取,无视自然的规律和限度,过度开发和消耗自然资源,破坏了生态平衡。第二,人类中心主义导致了人与其他生物之间的不平等。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类是自然界最高级且最优秀的生物,其他生物是人类的从属与陪衬。这种“优劣二分”的生物观,使得人类对其他生物的态度变得傲慢且残忍,人类对其他生物经常实施滥捕滥杀,而无视其他生物的存在及意义,严重地破坏了物种的多样性。第三,人类中心主义导致了以利润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类是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利润是社会经济活动的目标。这种“利益至上”的功利观,忽视了社会经济活动的道德与责任,使得人类对待经济活动的态度变得短视且贪婪,使得人类对待经济活动的行为变得毫无节制和底线。人类无视经济活动的影响,追求无限制的经济增长和物质消费,大量排放污染物和温室气体,加剧了全球变暖和环境恶化。因此,要解决生态危机,需要从根本上反思和转变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建立一种以生命为本、以自然为友、以天地为家的新型生态观。这种生态观能够使人类与自然、人与其他生物、人与社会经济活动之间恢复和谐与平衡,最终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二)以唯科技论为“迷信”的西方唯技术论的道义批判

启蒙运动标志着人类理性的崛起,人类利用理性探索世界,人类的理性所形成的人类中心主义,必然会导致另一个命题的出现,即“对纯粹理性的子女——科学与技术的信仰”^{[2]4}。科学理性成为人类追求真理的指南,科学技术成为人类改造旧世界的利器,在科学理性和技术的加持下,推动人类社会朝着现代社会的进步和变革。人类在摆脱了“神性”的盲目崇拜,却又陷入了对“理性”的过度信赖,在此基础上衍生出了对“科技”的无限期待。但是,科技并非万能的“神灵”,也非万恶的“魔鬼”,科技本质是人类改造和控制自然的工具,其效果取决于人类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正如莱斯指出:“环境问题的根源不在于科学本身,而在于一种意识形态,现代科学仅仅是控制自然这一更大谋划的工具。因此,控制自然的观念是环境问题的最深刻的根源。”^{[3]2}

诚然,技术的更新迭代会使生产力形成“跃迁式”的提升,并给人类社会指出一条充满希望的道路。正如马克思所言:“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一点是一目了然的。”^{[4]424}但在资本主义框架之内,科学技术与资本进行联姻,资本增殖成为其主要目的,科学技术的中立性受到了冲击,呈现出了一种“非理性运用”。科学技术在非理性运用之下陷入了一个悖论:一方面遵循着“客观规律”来谋求发展;另一方面又违逆自然规律,从而导致全球性生态危机的出现。作为联结经济效益和环境污染的重要媒介,科学技术一经投产便由解放的力量转而成为自由的桎梏,资本挂帅后与人类至上的理性相结合便呈现出了扩张性和征服性特征,被资本所利用的科学技术不仅使自然难逃厄运,而且也使人类生存环境遭受严重威胁。海德格尔指出,“技术乃是一种解蔽方式”,并且认为这一“解蔽”有着两种基本方式:产出和促逼。“在现代技术中起支配作用的解蔽乃是一种促逼,此种促逼向自然提出蛮横要求,要求自然提供本身能够被开采和贮藏的能量。”^[5]自然在技术面前不再神秘,自然的魅力在技术的促逼式解蔽中完全被祛除,技术褫夺式地抽取自然资源并且排放着污染。人类的理性经过科学技术的加持后更加导致了人与自然之间隔阂的加大。人获得了对自然的优先地位,通过科学技术实现了对自然的“祛魅”,人类似乎认为通过科学技术来征服自然就会过得更为

舒适和幸福,反观自然则裸露无遗地呈现在被科学技术所武装的人类面前,任人践踏和掠夺。倘若人类仍然以征服者、开发者自居,终有一天将受到自然的“报复”。因此,这种以唯科技论为“迷信”的论调,并不能真正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反而加剧了生态危机。我们应当对这种论调进行道义批判,并重新审视科技观,揭示其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误解与误导,这需要我们积极探讨如何以合理的方式运用科技,以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三) 以西式民主为“迷信”的霸权体制批判

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建立在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经济基础之上,这种民主制度的目的是建立一个为资本主义经济服务的政治工具,忽视了人类对自然环境的责任和义务,从而为生态危机和社会危机的爆发埋下隐患。当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自诩为民主共和的“世界灯塔”,试图将“西式民主”和“普适现代化”混为一谈,并向世界广泛输出所谓的“民主”理论。西方资本主义的卫道士不断宣扬现代化模板“唯西独尊”,试图让许多发展中国家陷入“西方现代化”的“迷思”。他们在输出“现代化”概念的同时,也垄断了对于“民主共和”的话语权。

西方民主制度难以彻底解决生态危机,原因在于:其一,西式民主的程序性和生态结果之间的矛盾。西方民主强调多数人的意志及其公平的决策过程,但是理性的“程序正义”并不能保障这些过程会有利于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结果。西方民主造成这一矛盾的核心在于短期政治利益的取向和民粹主义的抬头。西方的“选票政治”往往依赖于选举和政治辩论来制定政策和解决问题,政客与政党之间的利益竞争也可能导致政策的不稳定性和延迟执行,政客们往往考虑的是短期变现和任期内的经济利益,而非需要长期规划和跨世代的生态目标,这样会导致政策反复和政党掣肘的现象,致使一些国家的环境策略可能随着执政党的更替而改变或取消。此外,在“西式民主”中泛滥的民粹主义从边缘逐步走向权力中心,一方面造成西方选民参政热情度的下降,另一方面导致民粹主义政党对传统建制派政党的冲击^[6]。其二,西式民主的限定包容性和生态危机的主体扩张性。西方民主主体认定和生态权利保护主体的认定之间存在着差异,“民主将整个人类包容为民主主体,而生态主义却要求将主体扩张为包括非人类甚至整个自然在内”^[7]。西方民主主体的概念包含着人类利益和权利,并以此为基础衍生的政治制度,这种政治制度反映了人类对自然的统治和控制的意志与需求。然而,这种民主概念没有突破“人类世”的范畴,而是将人类与自然相互割裂,忽视了自然界的内在价值与权利。因此,人们对民主的理解局限于人与人之间的权利,并没有上升到人与自然相互平等的权利,从而否定自然作为民主主体的资格,导致人类单向度地只求享受自然的权利而忽视应尽的义务。其三,西式民主的国别性和生态危机广泛性。西方政治学将国家视为一种非人格化的、掌握暴力机器的统治机构^[8],其核心目标是维护和增强本国的利益和安全。然而,生态危机是跨越国界与地域的全球性问题,不仅威胁自然界的平衡和多样性,也危及人类社会的福祉和发展。要将解决生态危机纳入西方民主制度的决策范畴,这意味着要打破西方政治学中的国别性思维,重新审视国家的利益、权力和责任的分配与平衡。因此,以西式民主为“迷信”的霸权体制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能解决生态危机的原因之一,我们需要对其进行批判,寻求一种以人类与自然为中心,而不是以资本和权力为中心的政治体制模式。

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优势

(一)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论支撑: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

西方的生态现代化理论是基于西方现代性的核心立场而建构的,这一核心立场包含着三个要素:其一是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类是自然界的主宰者,人类的利益和价值高于其他生命形式;其二是主客体

二元对立,认为人类与自然相互分离且对立的实体,人类作为主体可以利用科学技术来控制 and 改造自然;其三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认为个人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和行动主体,因此个人的自由是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这些元素相互联系和影响,共同构成西方生态现代化的思维框架和价值取向。因此需要从理念上对现代化道路的这种极端与狭隘的观念进行矫正,寻求到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道路。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我国提出的独具特色的现代化理论,它既继承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精髓,又对其进行了理论创新。西方生态现代化将自然视为与人对立的客体 and 对象,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则超越了这一种狭隘观点,施密特指出:“马克思的自然观与其他各种自然观的区别,首先在于它的社会历史的特征。”^[9]马克思主义自然观阐明,人与自然是一个有机整体,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都依赖于自然。但是,在资本主义架构下,人与自然之间发生了异化和矛盾,导致了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和环境的严重破坏。因此要解决这一问题,就需要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且建立一种以社会公平和生态平衡为原则的新型生产方式。马克思主义自然观认为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正确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关系:第一,要处理好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指出,自然对人而言具有绝对的先在性,人类需要承认自然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人类要把自然视为一种有其自身规律和价值的主体,人类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才能实现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第二,要处理好人类社会内部各个成员之间的关系。人类社会是一个多元结构,每个成员都有自身的需求与利益,因此,需要尊重和保障每个成员的自由与权利,增进每个成员的沟通与合作,以保持内部的协调与和谐。第三,要处理好人类社会与其他生物共同构成的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人类作为生态系统中的重要成员,在利用自身智慧和创造力来满足自身需要的同时,也需要承担和履行生态系统的保护和发展的责任与义务。三者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相互依存的,协调好这些关系,才能有效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类利用自然界的规律改造和利用自然的能力,体现了人与自然关系从必然到自由的转变。这一种能力使人类从自然界的被动适应者向着自然界的主动创造者的转变,正如恩格斯指出:“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10]518} 自然是一个有机的、独特的生态系统和生命系统,人对待自然的态度和方式最终会反作用于人本身。如果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和方式是尊重、合作、和谐的,那么人类就会得到相应的回报和支持,实现人与自然的共生共荣;如果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和方式是掠夺、攫取、破坏的,那么人类就会遭到自然的反抗和报复,导致人与自然的对立冲突。西方资本主义的理论将人类与自然割裂开来,将自然视为一种可以任意开发和消耗的资源或商品,而不考虑其内在价值和生态平衡。这种理念催生下的发展模式造成了资源枯竭、环境污染、气候变化等严重的生态问题,威胁了人类和其他生物的生存质量和未来发展。因此,我们需要对西方资本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进行批判,并提出符合我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的理论观念。

(二) 以人为本的道义支撑:现代化生态转型的价值取向

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和社会危机,是传统现代化模式的必然结果。资本主义社会本质是“利益至上”,它将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视为无穷无尽的消费品和替代品,忽视了它们的有限性和不可再生性。这种模式不仅危害人类的生存条件和生活质量,也损害了资本自身的生产和积累能力。因此资本主义社会面临着来自社会和自然的双重反抗力量,这种反抗力量不单单追求“唯经济增长主义”或“唯生态中心主义”,而是要求建立一种在经济发展和生态发展相互平衡和协调的发展路径。西方生态现代化试图通过技术创新、市场调节、政策干预等手段解决这些问题,但是无法改变其“物本”目标取向,因此宣告了资本主义难以从根源上解决生态和社会危机。

中国式现代化追求的是“民本”价值维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道义为支撑、以和谐为目标的价值取向。中国式现代化归根结底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包括环境等全方位需求,因

此,中国式现代化要顺利实现生态转型,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否则就会偏离社会主义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11]170} 这一论断,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深刻揭示了生态与民生的良性关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深厚的民生情怀和强烈的责任担当。我国在生态与民生方面也作出了一系列的宣传教育和政策引导,并且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响应和广泛参与。据《社会蓝皮书:2023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的调查显示,2022年我国城乡居中有83.2%的人愿意使用可再生能源或节能电器替代传统能源或电器,有86.4%的人表示愿意使用可降解或可回收材料代替一次性或难降解材料,有91.7%的人表示愿意参与各种环保志愿服务或捐赠活动^{[12]203-229}。调查表明,我国城乡居对环境保护的认同度和参与度都很高,为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提供了广泛的民意支持和社会基础。中国式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人民的需求为导向,最后以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结论。因此,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

以人为本的道义支撑的中国式现代化,其价值取向具有以下几方面特点:第一,是基于对人与自然关系本质的科学认识而形成的。人类认识到人与自然是一个有机互动的整体,人既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受到自然规律的制约,也是自然界的主体,能够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来改造自然。人与自然之间既存在着利益共享、责任共担、风险共担的关系,也存在着矛盾冲突、协调平衡、变化互动等辩证关系。第二,是基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和历史责任感而形成的。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认识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能够有效克服资本主义制度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是因为社会主义制度能有效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能够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共赢。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认识到了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责任感,既要为自身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福祉提供生态支撑,也要为全球的生态治理和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做出贡献,体现了我国对自身和世界的历史责任感。第三,是基于对人民群众根本利益而形成的。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人民群众是生态现代化建设的主体和受益者,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最大动力和最终目标。这一特点就要求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既要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又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环境需求;既要关注人民群众当前的利益诉求,也要关注人民群众的未来福祉。综上所述,中国式现代化为何以“民本”为价值维度,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中得出,与人民风雨同舟、生死与共是战胜一切困难险阻的根本保证。

(三)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体制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扭转近代以后的历史命运、取得今天的伟大成就,最根本的是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13]65}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在时间上属于“后来者”,但却能够以“引领者”的姿态走出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绿色发展之路,这与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核心的体制支撑密不可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同于西方生态现代化模式,它更注重党和政府在生态治理中的主导作用,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认识和创新实践。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式现代化,不仅促进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也有效推动了经济社会发展的质量、效率的变革,实现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共同发展。因此,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体制支撑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国式现代化成功实践的关键保障。

中国资源禀赋的基本国情体现在以下方面:人力资源丰富,自然资源紧缺,资本资源较少,生态环境脆弱。在追求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应当避免重走传统的粗放型发展模式。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通过社会主义强大的动员能力来号召全党、全国、全社会参与生态文明建设

和生态环境保护。首先,中国共产党在党章、法律等重要章程、条款中明确表达了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其次,中国共产党在党外开展广泛的绿色生活宣传教育。例如 2019 年国家发改委印发的《绿色生活创建行动总体方案》中指出的目标:“生态文明理念更加深入人心,绿色生活方式得到普遍推广,形成崇尚绿色生活的社会氛围。”^[14]另外,在各级党委政府中建立健全领导干部生态文明建设责任制度,将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纳入《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工作条例》,实行了“一岗双责”制,并逐步强化生态追责机制;最后,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中央生态环境督察,根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规定》,对破坏生态环境的重大典型案例进行严肃处理,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环境问题进行问责查处。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从认识到实践、从局部到全局、从当下到长远,正在发生历史性、根本性、全局性变化。近十年来,我国在经济总量持续增长的同时,污染物排放持续大幅度降低,政府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美丽中国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根据《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22)》的数据,2018 年至 2022 年,我国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提高了 12.3 个百分点,地表水Ⅰ~Ⅲ类水体比例提高了 9.7 个百分点,土壤污染综合风险指数下降了 8.6%,森林覆盖率提高了 1.2 个百分点,湿地面积增加了 2.1%,珍稀濒危物种数量增加了 3.4%^[15]。实践证明,高水准的生态环境保护既是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也符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具有强大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组织动员力和社会影响力,统筹规划全局、协调各方利益、动员全民参与,始终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和价值取向,不断聚焦人民群众感受最直接、需求最迫切的问题,并将生态环境问题提升到与党的使命宗旨和社会民生息息相关的高度,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科学引领和有力保证。

四、结 语

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根本的现代化,其价值取向是以人为本,是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而展开的现代化模式。实践表明,中国式现代化不仅能够有效应对生态危机和经济危机叠加的现代化危机,还有助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与西方生态现代化相比,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明显的特色和优势。

中国式现代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现代化模式,强调人与自然是统一的整体,要求人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相比之下,西方生态现代化则把人类置于自然的支配地位,将自然视为人类的附属物和工具,从而导致了生态危机的加剧。中国式现代化强调以人为本,将人民的利益置于核心地位,坚持从人民的基本需求出发。西方生态现代化是以资本为本、以利益为本、以科技为本,而忽视人民的根本需要,造成了社会的不公平、不和谐。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现代化模式,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决策力与创造力,并能够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参 考 文 献]

- [1] J·哈贝马斯. 东欧剧变与《共产党宣言》[J],李晖,编译.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7(3):48-50+19.
- [2] 戴维·埃伦费尔德. 人道主义的僭妄[M]. 李云龙,译.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
- [3] 威廉·莱斯. 自然的控制[M]. 岳长岭,李建华,译.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
- [4]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5] 海德格尔. 林中路(修订本)[M]. 孙周兴,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 [6] 赵俊杰. 当今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困境与新变化[J].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2(12):78-86+131.
- [7] 郭瑞雁. 当代西方生态民主探析[J]. 国际政治研究,2020(5):109-122+7.
- [8] 段德敏. 名词、概念与理论——西方政治思想中的“国家”[J]. 北大政治学评论,2019(2):22-49.
- [9] 施密特. 马克思的自然概念[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 [10]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11] 中共中央宣传部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 [12] 李培林,陈光金等主编. 社会蓝皮书:2023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
- [13]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 [14]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绿色生活创建行动总体方案》的通知[EB/OL]. (2019-11-06)[2023-09-12]. https://www.mee.gov.cn/ywdt/hjnews/201911/t20191106_741042.shtml.
- [15]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 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22)[EB/OL]. (2023-05-29)[2023-09-12]. <https://www.mee.gov.cn/hjzl/sthjzk/zghjzkgb/202305/P020230529570623593284.pdf>.

Harmonious Coexistence of Man and Nature: The Advantages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over Western Eco-Modernization

Wu Shishao Li Jiantao

(School of Marxism,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Guangxi 541006, China)

Abstract: The ecological crisis is a challenge facing the world today, and China and Western countries have responded to it accordingly. Western countries have proposed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which is based on anthropocentrism, technology-only theories and western-style democracy, but has not effectively addressed the ecological crisis. China proposes a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in which human beings live in harmony with nature; this modernization is based on Marxism, people-centeredness, and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s a guide and guarantee, and achieves a win-win situation in terms of economic, social and ecological benefits, which highlights the advantages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Keywords: ecological crisis; western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责任编辑:左福生]